



参 考

Reference Information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领导决策服务资料汇编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图书馆编

第二期

导 言

近日,《中国青年报》连载 6 篇关于独立学院“验收大考”延期的系列报道,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从教育主管部门到独立学院自身,从投资方到举办方,似乎都有话想说,很多问题有待商榷。对独立学院的管理,应当参照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对民营经济充分放权,把独立学院交还给市场。因此,本期《参考》仍将独立学院的转设作为重点加以讨论。

在中国众多的独立学院中,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是特立独行的一所。自从新东方集团总裁俞敏洪接办耿丹学院以来,这所独立学院便不断吸引着媒体的目光和公众的眼球。我们有理由相信,耿丹学院循着自己的发展模式发展下去,将会成为中国独立学院中一抹亮丽的风景线。

进入 2014 年以来,中国经济明显放缓。国内外媒体和各路经济学家都对中国经济作出了研判。本期《参考》精选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许小年先生的文章。诚然,我们很难赞同他们的全部观点,但“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保证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目 录

省级政府统筹地方独立学院的权力与责任将增大	1
独立学院大旗到底还能打多久	3
猛药治不了独立学院的病	7
“校中校”：独立学院规范发展最难啃骨头	11
能否把独立学院交还市场	15
耿丹学院，俞敏洪的“独立宣言”	17
吴敬琏：我不知道为什么增速那么重要	22
许小年：解读两会后中国经济政策和民企发展	27

省级政府统筹地方独立学院的权力与责任将增大

——292 所独立学院“验收大考”延期系列报道之三

“在涉及 292 所独立学院 275 万学生以及老师的利益问题上，不是简单依据教育部 2008 年颁布的《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教育部 26 号令）‘一刀切’，而是要按照稳中求进的思路，积极稳妥地推进。”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郭春鸣 4 月 23 日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披露了独立学院“验收大考”延期的主要原因。

按照教育部 26 号令要求，全国 292 所独立学院在 2013 年 3 月 31 日之前接受验收大考。本报今年 4 月 14 日、15 日分别刊登了《独立学院难“独立”》、《近七成独立学院由房地产等投资资本掌控》调查报道，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郭副司长透露：“教育部领导也很关注。”

独立学院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在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为扩大高等教育资源，在公办普通高校体制之外产生了大量的民办二级学院。这个自我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就是很多学院存在不规范。

到了 2003 年，“独立学院”才第一次正式出现在教育部《关于规范并加强普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管理的若干意见》中。教育部依据这份文件对全国 360 多所普通高校民办二级学院进行清理整顿，并取消了 100 多所民办二级学院的办学资格，从此把独立学院审批权限从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收入国家教育行政部门。

2008 年教育部 26 号令颁布施行以来，就按独立设置的普通本科高校标准来规范与要求独立学院，并在 5 年过渡期内给予了 6 条规范路径。第一，继续举办独立学院；第二，转设为民办普通本科高校；第三，以公办高校为主举办，“合作方”虚置，不具备独立校区，财产关系模糊，具有“校中校”特征的独立学院可以并入公办高校，也可以引入新出资方迁址实现规范；第四是合并继续举办独立学院；第五，由当地政府支持转为公办高校，转设后继续与政府合作；第六是转为其他层次的民办学校或终止办学。

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到 2013 年全国独立学院共有 292 所，在校生 275 万人，较 2008 年增加 57 万人。到 2013 年，全国有 35 所独立学

院转设为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本科高校（含辽宁两所独立学院合并转设，上海两所独立学院取消建制）。292 所独立学院校（含 9 所正在教育部审批过程中的转设学院）平均占地面积 575 亩，其中有 164 所超过 500 亩，较 2008 年增加 55 所。但是，按照教育部 26 令第十八条 500 亩的土地标准，仍有 128 所独立学院不达标。

若按教育部 26 令“验收大考”的标准“一刀切”，将超过四成的独立学院面临关停并转考验，问题的主体不完全是举办者，而是如何保障独立学院的广大师生利益，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敏感性。教育部党组研究认为，“需要对独立学院验收评价标准与工作机制进行更加科学的设置，既要尊重历史，肯定成绩，也要与时俱进”。

郭春鸣透露，教育部发展规划司正在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天津大学仁爱学院、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进行验收试点工作，以进一步细化独立学院验收细则，修改完善验收工作方案。

过去绝大部分独立学院都是省里审批的，教育部 26 令颁布施行以后，全国独立学院改革发展的矛盾与压力都集中到了教育部。因此，在破解独立学院发展难题过程中，需要加大省级政府统筹地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力度；对涉及到教育外部的政策问题，教育部向国家其他部门积极争取政策。

“对教育部 26 号令定的原则要不折不扣执行，要符合独立学院办学实际与教育规律，切实保障学生与老师的利益不受损害。要按照稳中求进的思路，边整顿、边过渡、边规范、边发展，积极稳妥地推进工作。”郭春鸣介绍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的工作部署时说。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郭春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校中校’成为独立学院改革发展过程中最棘手的问题。”从依法行政的角度，“校中校”可以按照教育部 26 号令的要求回归母体高校。然而，现实的问题是，地方财政要能够填补这个经费缺口；独立学院教师以何种身份回归母体高校，尤其是在“985”“211”大学聘任教师岗位要求越来越高，非留洋、非名校毕业的博士、硕士有多少竞争力？

——《中国青年报》2014 年 4 月 25 日

独立学院大旗到底还能打多久

——292 所独立学院“验收大考”延期系列报道之四

这一次，“狼”真的来了。

一方面，教育部要求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对没有完成规范验收工作的独立学院实行严格的招生计划管理，督促其加快规范工作进程。另一方面是，独立学院发展 10 多年来，在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缺少一个准确的定位，不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没有涉及这个问题，而且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对合理回报等有关问题都没有说清楚，独立学院的发展一直比较尴尬。

再加上与母体高校、投资方等各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以及一些难以解开的“死结”，“独立学院的大旗到底还能打多久”的困惑在业界弥漫。

独立学院的历史贡献

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统计，截至 2013 年年底，全国独立学院共有 292 所，在校生达到 275 万，已经形成了 2000 多亿元教育资产。

“对独立学院的发展过程要辩证地看。”高等教育学博士、宁波市教育局副局长胡赤弟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

在 1999 年后的五六年中，中国高等教育以不到两倍的投入，让招生规模扩大了 5 倍。这在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都是少见的现象。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独立学院既是一种应急之举，也是一种改革探索。

首先，满足广大群众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现实需求，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独立学院本科在校生约占全国普通高校本科在校生的 18%，在广东、浙江、河北等省，这个指标分别达到 28%、29%、33%。

其次，整合社会资源、弥补了我国高等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1999 年至 2001 年扩招期间，全国普通高校自筹收入从 1998 年的 202.2 亿元增加到 2001 年的 553.3 亿元，增长 1.7 倍，占普通高校总投入的比例也从 39.1%增长至 47.4%。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独立学院的学费贡献。

第三，优化了我国高等教育的结构与布局。江苏省 25 所独立学院，有 15 所分布在常州、镇江、泰州、苏州、南通、徐州、扬州等地级市，改变了以往本

科高校集中在省城的状况。广东省珠海市过去高等教育资源缺乏，同吉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合作举办 3 所独立学院后扭转了这种格局。

此外，独立学院的产生也起到了高等教育改革“减压阀”的作用。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党委书记胡礼祥说，上个世纪末，一方面新浙江大学组建后被寄予建成世界一流、高水平综合性大学的厚望，另一方面适逢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需要扩大招生规模满足广大学生上大学的需求，两者之间怎么平衡？

据知情者透露，该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质问浙江大学领导：浙江省 4 所“211”大学被合并了，你们扩招了 4 个学生，对得起老百姓吗？在这种背景下，教育部同意浙江大学用新机制、新模式分别与杭州、宁波市政府合作举办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省内承担类似历史使命的还有宁波大学科技学院、嘉兴学院南湖学院。前者的创办背景是宁波大学与原宁波师院、原浙江水产学院宁波分校三校合并。后者是浙江经济高等专科学院和嘉兴高等专科学院联合组建嘉兴学院不久，平湖师范学校、嘉兴卫生学校、浙江会计学校、嘉兴市粮食干部学校并入的产物。由于母体学院刚升本科，合并进来的学校有中专、大专层次，有公办、民营体制不等，就创办了南湖学院来解决这些难题。

专业结构与母体高校严重趋同，竞争处于明显劣势

据本报记者调查，某些独立学院办学方向有偏差，办学质量不高；存在急于求成、急于盈利的倾向；内部管理体制没有理顺，申办学校和合作方的责、权、利不明确，造成申办学校在教学质量上没有尽到责任，合作方在办学条件建设上没有到位甚至玩“空手道”，给学生培养与就业带来很大隐患。

以广东省 17 所独立学院为例，共开设 94 个专业，占全国高校专业总数的 15%，但涉及哲学和历史学外的 9 个学科门类。有的学校开设近 40 个专业，有的学校专业方向的数量远超专业数量。

从 2009 年各招生专业计划看，该省 17 所独立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英语专业招生 6400 人，占全省独立学院招生人数的 13.5%。此外招生便集中在艺术设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市场营销、会计学、财务管理、物流管理、行政管理、网络工程等热门专业。理、工、农、医各门类开设专业虽多，但招生人数很少。

在重庆市，独立学院专业设置与母体高校的雷同率达 60%。中部某省 20 所

独立学院设立的 416 个本科专业,与母体高校雷同的有 403 个,比例高达 96.87%。其中 13 所独立学院的专业设置与母体高校完全相同。

据知情者透露,全国近 300 所独立学院,有 75%开设了英语专业,71%开设了计算机技术专业,62%开设了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艺术设计、市场营销、工商管理、会计管理等热门专业开设率在 40%以上。

在独立学院引进高层次、高水平教师难,硕士毕业生拿来直接教本科生的背景下,这种格局既加剧了全国独立学院之间的恶性竞争,也造成了独立学院与母体高校之间的同质化发展,且独立学院处于明显劣势。

价值观与利益诉求不同,一些办学方自奔前程

全国近 300 所独立学院,能够比较轻松存在的不到一半。江苏省 25 所独立学院,只有 10 来所“不愁生计、活得比较好”。苏州大学原副校长殷爱荪说,大部分独立学院依附母体,离开母体高校无法生存,不像民办高校具有竞争意识,独立学院的最后走向很难预测。

不过,北京、上海等市独立学院发展的轨迹可给我们提供某些参照。新中国成立后,有相当多的部委高校集中在京、沪等地。较之全市范围内的 8 所“985”高校、26 所“211”高校、30 多所公办普通高校,北京市 5 所独立学院显得可有可无。

上海在 2002 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 51%,由大众化阶段向普及化阶段发展,并拥有 4 所“985”高校、9 所“211”高校。因此,独立学院在上海不具备充分发展的社会基础,也不是该市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方向。

直到 2004 年上海才创办第一所独立学院,即复旦大学太平洋金融学院,到 2008 年发展至 5 所。不过,目前该市独立学院不断萎缩,只有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被批准招生,其他独立学院停止招生甚至消亡。其中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因素。

据统计,2008 年上海市公办普通高校生均投入 3.5 万元,加上学费 5000 元/生,若把科研等专项投入加上去,高校生均年收入可达 4.5 万元。比较之下,独立学院收费 1.7 万元/生,加上每年 3000 元住宿费,不到前者收入的一半。

2009 年在教育部 26 号令颁布周年之际,全国独立学院协会近 300 所学院相聚沈阳理工大学应用技术学院,探讨独立学院的“撤、并、转”等战略问题。时

隔一年后，浙大城市学院、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等部分同类型的学院退出了该组织。用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党委书记费英勤的话说，地方政府与高校合作举办的学院，与独立学院价值观不完全相同、利益诉求不完全一样。

与此不谋而合的是，这次活动的承办方沈阳理工大学应用技术学院与沈阳农业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合并转设为沈阳工学院，而全国由独立学院转设成民办本科高校的共有 31 所。

宁波大学科技学院党委书记徐军伟说，经历新一轮高等教育经费增长，全国公办本科高校国家生均拨款在 1.2 万元以上，上海、北京、广东等省市公办本科生均经费突破两万元，独立学院的生均 1.6 万元收费没有任何优势。再加上缺乏获取政府办学资助的渠道，还要扣除上缴母体高校的各种资源占用费，这种差距会越来越大。

甚至出现某省教育厅、财政厅、发改委出台政策允许独立学院 25% 专业上调学费 50%，独立学院都不敢涨的现象。一涨学费就意味着减少生源，生源减少就陷入学费总量锐减的恶性循环。

独立学院究竟是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中的过渡产物，还是长期存在？浙江嘉兴学院党委书记徐宪民自问自答地说：“它一定是过渡的。”重庆市教育委员会的有关同志也认为，“过渡性就是权宜之计，意味着独立学院自出生之日起就在时刻准备关停。”

对于独立学院领域较为悲观的氛围，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郭春鸣认为：“主要是受政策不配套、机制没理顺的影响。独立学院作为高等教育办学的一种机制将长期存在，尤其是十八大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将给独立学院带来新的机遇。”

——《中国青年报》2014 年 4 月 29 日

猛药治不了独立学院的病

——292 所独立学院“验收大考”延期系列报道之五

“一直想向国务院总理写信反映教育部 26 号令不是在促进独立学院发展，而是在制约、阻碍其发展。然而，又担心母体高校与上万学生受到打击与报复。”近日，南方一所独立学院院长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诉说了自己的焦虑。

独立学院改革问题变得如此突出，是否与高考生源减少有关？湖北省教育厅有关人士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透露：“生源危机不是主要因素，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各方围绕独立学院的利益博弈。”

“在 26 号令施行之前，独立学院没有这种紧迫感，‘验收大考’以后，各种矛盾比较突出。”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郭春鸣说。

大部分院长痛苦的背后是各方利益博弈

“对于全国 292 所独立学院、260 万名左右的在校生群体，国家法律没有给予任何形式上的认可。以教育部部门条例代替国家法律，给独立学院发展带来不少的困惑与痛苦。”上述这名院长说。

据介绍，独立学院从诞生至今，仅教育部在 2003 年发布《关于规范并加强普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管理的若干意见》，2008 年下发的《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简称教育部 26 号令），对涉及独立学院发展的核心问题一直没有触及。

相关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的人士透露，目前，地方政府、高等学校与投资人围绕独立学院展开激烈的博弈，导致整个改革发展规划无法推进。

具体说来，首先，独立学院资产的性质没有明确。独立学院投资人普遍担心，一旦哪天政策变化，投资人将会损失巨大。由此，还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虽然说资产过户到独立学院名下还是属于自己的资产，但由此产生的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税费，投资人显然不愿承担；另一方面，母体高校也认为，现在一年坐收几千万元资金挺好的，为什么不让其继续存在？

现实中，因为改革政策不配套，部分转设为民办本科高校的“吃螃蟹者”四处碰壁，失去了独立学院的体制、机制优势，处在一个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夹心层”。此外，曾经的母体高校仍不肯失去既得利益，变着法子、甚至不择手段

从民办本科高校索要可观的经济利益。

据记者调查，今年以来，部分独立学院举办各种论坛、沙龙以及会议，以形成合力对外宣告：“母体高校收了这么多年管理费了，独立学院‘独立’不该再收‘分手费’，甚至希望教育部出台指导性意见，不准收取‘分手费’。”

但一些母体高校则表示，自独立学院创办以来，他们投入了品牌、师资及管理大量无形资产，两家要“分手”不可能没有补偿费。

郭春鸣副司长表示，普通高校与举办方合作举办独立学院时，教育部不是“介绍人”和“证婚人”，现在双方要“分手”，教育部也不是裁判，不偏袒任何一方。双方终止合作办学协议，可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协商解决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独立学院牵扯的面太大，背后又有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甚至有一些独立学院背后还站着‘副省级干部’，谁能撼得动？”一位教育部门的内部知情者说。

对独立学院发展问题要分门别类破解

“教育部 26 号令对真的独立学院还行，就怕一些独立学院是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王佐书说。

目前，独立学院尚未完全理顺投资方、举办方和董事会、学校之间的关系；大多数独立学院董事会章程流于形式，缺乏对董事长及董事的约束和限制性条款；多数独立学院董事长直接插手独立学院的办学和财务管理；部分独立学院财务管理缺乏有效监管，学费收入被投资方随意挪用甚至成为投资方的现金流。

同时，政府各部门政策法规“打架”的现象比较突出。虽然教育部 26 号令规定，独立学院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出资人取得合理回报的标准和程序，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但《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并没有对“合理回报”作出明确界定。

有的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对独立学院发展提出“谁投资、谁受益”原则。然而，由于这种投资预期的降低且无法兑现，部分投资方转手卖掉独立学院转战其他领域。有的投资方甚至通过股权溢价变更，逃避了独立学院重大变更向教育行政部门备案的监管。

投资方有自己的委屈：当初政府穷，为了解决老百姓孩子上大学问题，就鼓

励民间资金办学，并许诺可以拿合理回报；后来政府慢慢有钱了，就把独立学院举办者描述成自私自利的“葛朗台”。

此外，国内独立学院群体的身份归属一直十分敏感。据本报记者调查，浙江省独立学院由省政府统一协调登记为事业单位；广东省、湖北省、重庆市等地的独立学院则在民政部门登记为民办非企业；贵州省 8 所独立学院只有 1 所登记为事业单位，其余 7 所登记为民办非企业。

划入民办非企业序列的独立学院就涉及税收等各种财务问题，教职工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等与事业单位相差甚远。由此在部分独立学院出现教师一旦评上副教授职称，就为了事业单位身份宁可“下嫁”高职院校的现象。

东部一所学院党委书记向本报记者透露，“对独立学院教职工身份归属等问题，上面要求‘对外不宣传、对内不讨论’。”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当初对独立学院未来发展缺乏顶层设计，先办起来再说，现在大家看不到发展空间，到了该理顺的时候。”大部分院长说，“家长希望孩子在独立学院能学到真才实学，可是学院则成天为向何处去发展而犯愁，没有把心思放在培养孩子上。”

“从严格意义上，把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等这类由地方政府与高校合作举办的学院，划入独立学院阵营就是最大的遗憾。”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党委书记费英勤说，在教育部 26 号令出台前，这类由名校与地方政府合作举办的学院办得很好，有的综合实力已经超过一些地方本科高校。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院长徐建华则建议，对那些由地方政府与高校共同举办、没有投资人的学校不要生搬硬套“非公即民”的模式，在保持原有经费来源方式基础上，采取公办新机制的办学模式，按照省属普通高校标准和要求进行管理。

对于普通高校独自举办、普通高校与国有资本共同举办的独立学院发展方向同样值得关注。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院长叶国灿说，绍兴市为了把该学院建成全市第二所普通本科高校，除给予新校区建设土地指标等支持外，元培学院收入上交母体高校的 25% 部分由市财政直接拨付给绍兴文理学院。与此同时，浙江海

宁、桐乡、诸暨、富阳等一批经济发达的县市正在与省内高校合作，把独立学院引进建设成为地方普通高校。

据记者调查，目前全国独立学院的改革期待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地方政府财政支持，独立学院适当削减招生规模，转成地方普通公办本科高校；二是与地方政府继续合作举办，规范发展；三是转设为民办本科高校；四是走中外合作办学之路；五是对不符合条件的“校中校”坚决取消；六是对办学质量不行的予以停办。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措施解决不了独立学院根本性问题，迫切需要‘一揽子’改革计划与政策。”部分独立学院与学者建议，“由国务院牵头，国家教育、财政、发改委、税务、国土等部门进行顶层设计，把独立学院具体的过渡措施和进一步发展的权限、责任下放给各省级政府。”

“不管是教育部 26 号令执行中遇到多大阻力，还是独立学院作为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一种过渡性形态，我们都不能忽视广大在校学生学习权利的保障问题。”江苏省教育厅有关同志说，“对待改革的产物，一定要以改革的方式来对待它，呵护它。”

——《中国青年报》2014 年 4 月 29 日

“校中校”：独立学院规范发展最难啃骨头

——292 所独立学院“验收大考”延期系列报道之六

“北师大珠海分校没有任何投资人进来同样办得挺好，招生都在二本线以上，国有资产怎么转为民办？”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钟秉林对独立学院“非公即民”的做法表达了不同意见。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院长徐建华等人。徐建华介绍说，该学院前身是 1986 年建立的中山大学孙文学院，1995 年改成省市共建的中山学院，2002 年改为现名，由中山市政府和电子科技大学合作建设。

据知情者透露，为让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等国内少数几所高校与地方政府合作举办的学校，即没有投资人的高校达到教育部 26 号令要求，有教育部官员到校指导时出了一个主意：可以引入一个社会出资者，否则就不是民办机制，不得按民办学校的标准收学费。

“非得让我们去找一个投资人来‘打架’吗？”有学者说，“投资人和学校在办学上的价值取向有冲突，没有这个必要”。

部分省份连夜“超生”的一些独立学院成“怪胎”

有关人士向中国青年报记者披露独立学院政策被异化的过程时说，独立学院最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自己审批。因此，没有什么规则可依，审批管理比较混乱。

东南大学 1997 年按招生比例的 2%，在高考落榜生中录取一批学生进行成本收费，学生 4 年通过全部课程颁发毕业证书。获悉相关信息后，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也去教育部申请了不等的指标。

1998 年全国两会期间，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指出这是“乱收费”，教育部学生司叫停了这种“宽进严出”的试点。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就把报告送给分管副省长。

分管副省长表示，江苏省连续几年扩招 1 万人需要有载体，此举很好。建议说，第一，你们不要在落榜生里招，干脆纳入省招生计划在第二批次中招；第二，不要只是东南大学、南京大学这样搞，其他学校也可这样办。所以，该省 1999 年就一下出来了 12 所“校中校”。

到了 2003 年，教育部意识到这种无序状态对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带来的危害，决定从 2004 年起把独立学院审批权上收到教育部。就在独立学院审批大权上收的前夕，部分省份连夜“超生”独立学院。

“真牛气，在短短时间内就审批了 20 多所独立学院。”引用一位知情者的话说，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紧急通知每所高等学校，必须马上注册成立一家公司，申报合作举办独立学院。

授予独立学院举办资格与招生指标，就相当于给普通高校派发了一个“红包”，给了一条财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陵学院董事长黄飞健表示，江苏省的情况则更为特殊。“省内 25 家独立学院大部分是母体高校投资，另有 10 多所高校的二级学院连户头都没有，也直接招生。”

据知情者透露，金陵科技学院龙蟠学院、南京晓庄学院行知学院、淮阴工学院江淮学院、淮阴师范学院文通学院、盐城工学院博雅学院、盐城师范学院黄海学院、常州工学院延陵学院等二级学院，依附于母体高校并颁发母体高校的证书等。

从竞争业态来看，“校中校”在高考第三批次招生过程中，对民办高校具有超强的杀伤力；从教育教学资源来看，“校中校”完全依附于母体高校少有的实验设备、图书资源、体育设施等，对母体高校学生来说十分不公平。

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说，在高等教育资源普遍紧缺的情况下，有些地方和高校探索举办具有民办性质的二级学院。这些二级学院并没有经过教育部审批，相当一部分是高校自己试办的，有一些是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同意的。

谁是“校中校”幕后最大的老板

“较之北师大珠海分校、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浙大城市学院等，高等学校‘校中校’是另外一回事。”钟秉林说。

据东部某教育行政部门高等教育处一位副处长介绍，公办学校出资、民营机制收费的“校中校”之所以遭到民办高校抗议，很重要的因素是它们戴着“红帽子”、含着“金钥匙”出生，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强势地位，不断压缩民办本科高校生存空间。

据了解，对公办大学的“校中校”及其衍生出的各种复杂利益关系，教育部纪检监察部门曾派出队伍调查，部分省（市）的公办高校有所收敛。

湖北省是国内拥有独立学院最多的省份之一，独立学院兴起与政府对高校经费投入严重不足有关。据统计，该省 1999 年经费总支出 120.15 亿元，其中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 68.02 亿元，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全省 GDP 的 1.76%，明显低于全国平均值 2.75%。人均教育经费总支出 202.1 元，在全国排第 18 位，1999 年普通高等教育财政预算内拨款 6.32 亿元，占预算内教育拨款总支出的 12.55%。

“不创办独立学院，母体学校都难以活下去。”知情者说，三峡大学新校区建设产生欠债，由三峡大学、宜昌市政府及宜昌教育实业开发总公司在 2000 年合作举办三峡大学科技学院，每年返回母体高校资金约 1 亿元，极大缓解了三峡大学发展的困难。

由于历史原因，福建省内高校不多、校园面积达不到办学标准。为适应高等教育发展，建设新校区以扩大办学规模成为首要任务。同时，政府不可能拿出足够经费就出台政策，高校办独立学院的收入用于还新校区建设的贷款。

贵州省独立学院办学初期的目的也是为解决公办高校经费不足的问题。贵州财经学院商务学院创办初期招收的省外生源占 60%以上，每年交母体高校 7000 万至 1 亿元。遵义医学院医学与科技学院原院长吕斌说：“没有独立学院，贵州的高等教育还要落后 20 年。”

“校中校”改革提议未获得省级层面积极响应

自“校中校”出现以来，就一直成为高等教育界人人喊打的对象。许多民办高校期望教育部 26 号令对这个特殊群体“切一刀”：要么回归母体高校，要么转办或停办。部分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独立学院院长则说：“教育部 26 号令只适合经济发达、财政状况好的东部省份少数独立学院；对于中西部地区‘一刀切’严格执行的话，将使一部分学生失去接受更高教育的机会，造成中西部省份本科入学人数在某个时间段出现大的波动。”

以中部某省为例，2013 年高考录取率达到 80%左右，其中本科生录取率约占 40%；独立学院约占本科生录取人数的三分之一。若把独立学院招生指标全部压到一二批次录取的普通高等学校去，省级财政根本不愿意这样做。

“教育部所属高校生均财政经费拨款是地方高校生均财政经费的 3 倍甚至更多。”部分院长向本报记者透露，在湖北、湖南、江西以及一些西部省份，很多时候不是普通高等学校要举办独立学院，而是省级财政没有办法承担这么大的

高等教育规模。目前，江苏省独立学院在校生约占全省普通高校在校生的 25%。苏州大学原副校长殷爱荪说，不管各个独立学院办得如何，这块规模效应不可能不要。如果独立学院都按规定不办了，全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马上掉下来。人大代表就会问怎么回事？省长根本吃不消。

现在出现一种“假回归”的现象，即“校中校”回归母体高校变成公办的二级学院，一边享受公办高校的经费拨款，一边继续划为独立学院体系，按民营机制高收费，所收学费进入母体高校账户。据东部地区一所学院党委书记透露，治理“校中校”的最大阻力与困境在于，母体高校的经费来源及教职工福利待遇下降以后怎么办？大学校长找省长、省长就会找教育部部长。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郭春鸣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校中校’成为独立学院规范发展过程中最棘手的问题。”某省约有 12 所独立学院属于“校中校”，回归母体高校省级财政大约需要增加 10 亿元教育经费。教育部发展规划司调研时提出，在全省普通本科高校总体招生计划不减的前提下，把“校中校”回归母体后的招生计划调整给其他的公办、民办普通本科高校，教师按“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回归，此建议尚未获得省级层面的积极响应。

独立学院应与地方高校转型区域高教布局结构优化统筹推进

“从教育部依法行政的角度，‘校中校’应该按照教育部 26 号令的要求回归母体高校，也可以引入新出资者迁址实施规范。”郭春鸣副司长说，现实的问题是，省级财政要能填补这个经费缺口；独立学院教师以何种身份回归母体高校，尤其是在 985、211 大学聘任教师岗位要求越来越高，非留洋、非名校毕业的博士、硕士有多少竞争力？

独立学院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一支生力军，涉及广大师生以及千家万户，不是办了一家中小企业，说关停就关停的。教育部发展规划司认为，在破解独立学院规范发展难题过程中，应与地方高校转型结合起来，由省级政府统筹区域内高等教育结构优化，先调查摸底，然后科学规划，再分步解决。

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介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包括独立学院在内的民办教育改革工作涉及教育部等多个部门，中央领导同志以及教育部党组高度重视，正在积极推进。

——《中国青年报》2014 年 4 月 30 日

能否把独立学院交还市场

近日,《中国青年报》连载 6 篇关于独立学院“验收大考”延期的系列报道,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从教育主管部门到独立学院自身,从投资方到举办方,似乎都有话想说,很多问题有待商榷。笔者以为,如何破解困境,给独立学院“插翅”,让她真正“飞起来”,才是关键所在。

对独立学院的管理,应当参照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对民营经济充分放权,把独立学院交还给市场。具体办法就是,“一刀切,切一刀”,要么“转民”,要么“并公”,按其各自的规律发展,这才是独立学院的光明前途。

“一刀切”,就是要求凡举办方为民办者应一律“转设”为普通民办高校,不再以独立学院的形态继续存在。独立学院只是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一种过渡形式,其历史使命已经完成,长期冠以公办高校的牌子办学是不可能持久的。

《关于规范并加强普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管理的若干意见》的文件中一开始就明文规定:“一律采用民办机制”。民办就是民办,为什么要长期挂一所公办大学的头衔?目前,全国大部分独立学院已经可以“独立行走”,已“转民”的 35 所独立学院发展情况良好。

“切一刀”,就是要求所有“校中校”一并回归或停办、转办。既然“校中校”不符合 26 号令,对母体高校的依附度高,根本没有坚持“民、独、优”的三原则,就该下大力气,突破阻力,强行促其“改”。当然,“改”的具体方式可因校制宜。

独立学院想“独”到底难在哪儿?

首先难在“过度抽血”。独立学院的经费现状是两条管子“抽血”,一条是投资方抽取合理回报,一条是母体高校抽取“合作办学费”。既然公共财政尚未“输血”,更要立即停止“抽血”了!这也是给独立学院“解套松绑”,让独立学院“休养生息”的关键点。随着 GDP4%的教育经费投入到位,公办地方高校生均拨款平均水平已达 1.6 万元,加上学杂费等收入,生均培养费至少 2.2 万元以上,远远超出独立学院 1.5 万元/年的生均培养费,停止“抽血”的“火候”也到了。当然,考虑到公办高校在举办独立学院时所做的贡献,国家财政可给予其

一定奖励或补偿。

其次难在“无主动权”。按现行办法，母体高校不同意，独立学院就不能“转”。据调查，多数已“转设”的独立学院与母体高校都进行了长时间的“分手”谈判，不交“分手费”，就没有“分手协议”，没有“分手协议”，就不可能“转”。如果独立学院自身不能决定其发展方向的话，就没有任何办学自主权可言，教育部要求的“独”又怎么体现？要变“绊脚石”为“垫脚石”，就应当规定，独立学院自身可首先提出“转设”申请，其他事情由教育主管部门协调解决。

再次，难在“指标欠妥”。以办学规模 5000 人以上的高校为例：现行 54 平方米/生的校园占地指标要求，对国内许多处于中心城市的高校都不太现实，而且随着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逐步减少，到 2020 年仅有 8208 万人，届时对已扩建的校园占地面积又如何处理？必然会带来新的问题。

新媒体时代，电子图书算不算“书”？这是一个荒诞的问题。按照现行图书指标，一所大学购买的几百万册电子图书竟不能计入图书总量，这显然是教育落后于时代发展的表现。有人说，这里夹杂着“傲慢与偏见”。对新建院校与百年老校同样要求 100 册纸质图书的结果是，许多独立学院不得不用车皮一箱箱地采购废旧图书以充数。

当然，独立学院“转民”后，教育主管部门还应“扶上马，送一程”，落实公民办高校的“三个平等权”（学校、教师和学生），让公共财政和政策支持的“阳光”普照大地，形成公、民办高校良性的竞争格局，才更有利于整个高等教育形成持续良性的竞争活力。

——《中国青年报》2014 年 5 月 10 日

耿丹学院，俞敏洪的“独立宣言”

近日，有媒体报道，26 号令 5 年“孵化期”满时，全国 315 所独立学院中只有 23 所申请转设为独立设置的民办本科高校，另有 8 所独立学院进入转设考察、公示期。此后，教育部 2013 年 5 月又把独立学院规范验收的最后期限延迟到 2016 年。

4 月中旬，新东方创始人、耿丹学院理事长俞敏洪邀请众多媒体记者来到位于顺义牛栏山脚下的耿丹学院。名为赏樱，老俞实则更希望借助自己的资源助力学院的发展。这已不是老俞第一次亲自为耿丹出马了。

作为一个缩影，耿丹学院的变革，也折射出国内独立学院未来的“独立”之路将如何走。

“独立”并不容易

2013 年，一直想办大学的俞敏洪接手耿丹时，正赶上独立学院“转设”的节点。

所谓“转设”指的是 2008 年 2 月，教育部出台《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俗称 26 号令)，为独立学院规范发展制定了路线图：独立学院在 5 年过渡期内必须资产过户，必须引入民间资本，通过依靠自身努力来面对市场竞争。

对于大多数独立学院而言，独立之路却颇为艰难。

在不少独立学院的办学者看来，教育部 26 号令设置了很多准入门槛与法律责任，但其具体的规定与做法脱离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仅“不少于 500 亩的国有土地”这一条就让很多独立学院的“转设”之路止步不前。

这也是俞敏洪目前还没解决的难题，“耿丹学院只有 400 多亩地，但独立大学要求人均一分地，400 多亩地只能容纳 4000 多个学生，我们已经有 6000 个学

生了，那我怎么办？生均面积与教学质量有必然联系吗？我能理解教育部的规定是基于好的出发点，但的确不符合目前实际情况。”俞敏洪语气中透着无奈。

这并不是俞敏洪一人的苦恼，仅就北京的5所独立学院，目前还没有哪所学院能满足这一条件。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院长李杰就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院长而言，不要说500亩土地，有1000亩土地更好，可投资方就不一定同意。何况国外一些知名大学都没有达到500亩土地面积。”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一直关注独立学院的问题。在熊丙奇看来，对于已经实现独立法人、财务、证书、校园、师资的独立学院，全部独立办学，不要再纠结其办学指标，“道理很简单，如果其办学条件不具备，那么这些学校现在办学也存在问题，那么，为何独立有问题，不独立就没问题？这是什么逻辑？”

“独立”后的挑战

“出生”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独立学院，借着母体学校的牌子，曾经历过一段快速发展期，被认为是对缓解高等教育资源紧张，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独立学院自诞生之日起，就争议不断，焦点之一是考生以二本或三本的分數进入独立学院学习，四年毕业之后却可获得一本学校（独立学院的举办者）的毕业证书，有的高校还曾因此闹出“文凭门”事件。

摘去公办高校招牌，不再发“母体学校”学位证书，而改发独立学院学位证书之后，独立学院势必面临生源减少、声誉下降、就业受挫等挑战。目前业已出现的情况是，随着高考报名人数持续下降，一些安排在第三批招生的独立学院，已

难以招满学生。在整个民办高校衰退、收缩的大环境下投资耿丹学院，俞敏洪一度被贴上“拓荒者”、“理想者”的标签。

“民间对于民办大学的信心和认同不可能由任何人单个完成，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我知道什么需要耐心等待，哪些可以尽快推进”，在俞敏洪对耿丹学院的发展规划中包含了这些步骤，“首先，当然是要脱离大学的附属；第二，设置的专业要符合未来发展方向，能使学生既能够学到思想，培养人格，又兼顾工作所需的实用技能；第三，通过更好的待遇，吸引更好的老师。第四，请真正懂大学的人，进行长久的管理。”

俞敏洪坦言，“所有这一切，可能都不是两年、三年能够完成的，五年基本能够奠定学校发展的基础，十年稍微有点苗头，二十年让大家认可这所学校是民办大学中间最好的，那就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了。”

对话

“希望各大企业来抢学生”

●俞敏洪，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耿丹学院理事长

新京报：有观点称，独立学院转设的重要阻碍还有与母体校间的利益博弈，如高额“分手费”和每年上交给公办高校的管理费？

俞敏洪：我们跟北京工业大学关系很好，北工大也支持我们转设，而且不需要做太多额外补偿，只要转设成功，我们立刻就脱钩。

新京报：你曾说过，目前中国的私立教育靠学生学费维持运行，是一个“荒谬的现实”？

俞敏洪：靠学费意味着，不管你怎样节约，学生都不可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因为你就那点儿钱，怎么请来好老师？请大师要有巨大的资金支持，而且必须要有可持续性的资金支持，像哈佛、耶鲁这样的学校，光捐款基金就高达 300 多亿美元。我的计划是建立大学的基金会，让基金会通过资本运作赚钱，支持学生的学费并聘请著名教授。

新京报：一所独立学院，如何引来名师、还能留住名师？

俞敏洪：一是在现有教师队伍中慢慢培养大师，比如挑选资质不错的年轻老师送到国外名校攻读博士学位，等培养到四五十岁，他们自然以耿丹为家。第二是聘请临时大师，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軾每隔一周过来上课。我们还会不断邀请各界著名人物来讲课。第三是通过基金会聘请一些大师做常驻教授。还有一些障碍需要政策支持才能得以解决，比如纠正对民办学校教师的身份歧视，让民办学校教师与公办学校教师享受平等的法律地位、同等的社保和退休待遇。

新京报：现在民办大学几乎全部划在三本，有些独立学院都招不满学生，未来生源质量如何保证？

俞敏洪：这种划分本身带有一定的歧视性。但生源之所以没有，根本原因是大学本身经营不好。招生问题会在民办大学出现，在公立大学也会出现。而家长是比较实际的，如果你能提高学校的声誉、提高学生学习热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我们还是能够与公办高校抗衡的。我会借助企业家资源，给学生安排更多实习机会，很快就会有 100 名学生到新东方实习，联想、万达、中坤这些大企业也会到耿丹招聘实习生。我希望未来能做到，在通识教育、专业教育之外，学生就业毫无困难，甚至是各大企业和机构来抢学生。

新京报：在培养学生方面，耿丹学院今年还会有哪些新举措？

俞敏洪：今年9月，会启动一个“企业家带徒弟”的项目，我会说服北大企业家协会、中关村(000931, 股吧)企业家协会的朋友，请他们每人认领一二个学生，不仅要负担学生的学费、生活费，而且要收他们做徒弟，负责他们的思想和精神方面的培养，要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我自己准备先带四五个学生，每人一年费用两三万元。

【独立学院大事记】

●20世纪90年代末期

国家鼓励公办本科院校结合社会资金，举办独立学院。

●2003年4月

教育部颁布8号文，要求独立学院做到“五独”：独立校园、独立法人、独立师资、独立财务、独立证书。

●2008年

教育部再次制订并发布《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

——《新京报》2014年4月21日

吴敬琏：我不知道为什么增速那么重要

日前，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接受资深媒体人罗昌平专访，这位 84 岁的经济学泰斗分享了自己对于经济、房市以及中国改革进程的一些观察，同时也谈及国企改革、混合所有制与企业家安全感。吴老认为，“国进民退”的根源在于利益，国企改革阻力并非不可克服，要做就一定能做到；而对于企业家移民潮，则需建立法治，切实保障物质财富、知识产权以及人民的基本权利，“否则的话，这种移民潮就比较难以制止。”

口述：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

我不知道为什么增速那么重要

问：您说 2014 年的经济可能会有些困难，这些困难可能在哪些领域或者是怎么一个方式呈现出来？

吴敬琏：我说了两句话，一句话说因为有十八届三中全会，所以今年会是全面开展改革的一年，或者叫做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如果这个改革顺利的话，那就会对我们的经济转型起到推动作用，经济就会逐渐向好。但是同时，改革也面临着一些障碍和困难，一个障碍就是从意识形态来的障碍，旧的意识形态会抵制改革；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有特殊的既得利益，就是以权谋私的社会力量，它也会反对和阻碍改革。第三，改革要见效需要一段时间，当改革的成本已经付出，而改革的效果还没有显现的时候，在经济运行上就有些困难，最突出表现就是因为货币过多，靠债务取得投资来拉动增长，集中表现为国民资产负债表，包括政府，各级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特别是国企的资产负债表，里面的债务太多，用经济学的术语说就是杠杆率太高，杠杆率太高，就会经济上出现一些问题。

问：这次两会，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把经济增速的目标锁定在 7.5 左右，您怎么看待这个目标？您能够接受的增速的底线大概是怎么样？

吴敬琏：我一直不懂什么叫做能够接受的增速，我们为什么一定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增速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增速那么重要。

问：可能在我们原来的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

吴敬琏：那是反过来说的，首先要问客观上要求有某种增速，然后才说因为

客观上需要这样增速，所以我用它来考核，而不是反过来，说因为考核的目标是这样，所以我就要有这个增速。我想李总理两会后的记者招待会说的是对的，其实所谓保增长目的不是增长本身，目的是要保就业保民生，这两者什么关系要把他弄清楚。我们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提高人民的文化和物质生活水平，这是一个根本目的，所以当然要保。可是这个保就业保民生和保这个速度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是需要研究的。所以一直有讨论，7.5、7 甚至不到 7，只要你能够保就业保民生，那就能够解决问题，所以我不觉得有一个什么叫做可以接受的增长速度。

债务风险像悬在我们头上的一把剑

问：您怎么看待改革的进程？

吴敬琏：改革的进程不可能是齐头并进的，有的可能快有的可能慢，如果很必要进行的改革呢，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把它往前推动往前进。还是要有信心，我们不如具体的来讨论哪些方面进的不够快，不能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没有动作，有些方面我觉得好像比原来预期还快一点。

问：比如说呢？

吴敬琏：比如说金融。金融最核心的是两条，一条就是进入限制逐步放宽。另外一条更重要的是价格放开，价格放开了一个是利率一个是汇率。现在贷款利率已经全面放开了，就剩下存款利率，两会期间央行行长周小川说，两年内开放。原来大家都以为会很长，现在看来可能要不了两年。这就表明在加快嘛！三中全会决定了财政改革，明确事权和支出责任要匹配，还有预算逐步的透明化和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预算执行的监督。

问：您之前讲过，可能中国最大的风险来自金融财政部门。

吴敬琏：风险主要的集中表现为资产负债表中的债务比重太大，就是经济学说的杠杆率太高。杠杆率太高他就可能发生小地震，小地震弄不好了最怕的就是引起系统性的风险。现在是在可控制范围内，但是他就像悬在我们头上一把剑一样，不知道他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还有一些外部因素，特别是我们亚洲有沉痛的经验，就是美元由走弱变到走强的时候，热钱就会往外流，热钱往外流，这个债务偿付风险就会加大，或者换句话说，泡沫破灭的风险就会增强。

问：那这个去杠杆化的过程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吴敬琏：去杠杆化从根本上说来要靠提高效率，换句话说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靠改革。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更大的作用，才能提高效率。但是，改革要见效，要很长的时间，在这个期间有各种变动的因素，我们要防止在这个期间出现系统性风险。那么可以做一些工作，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些可还的债务还掉，比如刚才我们已经谈到的，社会保障缺口。社会保障缺口是政府的一种或有债务。实际上是政府欠了职工的帐，特别是欠了改革前的老职工一大笔帐，这个债务想办法还了，这样杠杆率就可以降低，另外有些债务可还的尽量还了。你譬如说铁路总公司有将近三万亿债务，这个债务是不是可以跟这个公司化改制，和混合所有制结合起来偿还掉。

房价如此之高主因是货币超发

问：您觉得房价接下来是一个涨的势头呢还是下跌趋势？

吴敬琏：房价其实跟其他的商品价格是一样的，是由供求决定的，一方面就是供给，如果供给不足而需求过大，那么房价就会涨，这里讲的需求是有购买力的需求，不是那个脑子里想的需求。就是口袋里有钱这个需求。

那么这个需求其实是什么决定的呢？就是发票子决定。有人认为我们现在房价过高是因为供给不足，供给不足譬如土地供给等等。确实有这个因素。但是正如其他商品一样供给的变化是比较慢的，需求的变化是比较快的。要发票子，一声令下就可以发嘛！在中国的情况下，我认为使得房价如此之高的主要因素，是货币，货币的发行大大的超过了产品供给的增长速度。因为非常明显，因为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比起 GDP 的增长要快得多。如果按照弗里德曼的学说呢这货币根据是超发了，那么这个超发的货币它往哪里走呢，特别是中国人的习惯认为房子不会掉价，于是他都跑到房子那边去了，投资买房。房子有两种使用价值，一个是投资的对象，一个是住，满足住的需要。投资买房把房价炒很高，于是我们就碰到了一个现实问题，就是要住房的人买不起房租不起房。那么我的结论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货币继续超发，而供给又不增加的话，（房价）就会涨。但是从最近的情况看来，央行是不想大量发钞的，所以我没有这个结论说它还要涨。

那么问题既然是这样了，你要真是把货币供应量一下子收缩到位，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不主张“捅破泡沫”，这个东西你千万得小心，主动去捅会产生恶性循环，因为心理因素会起作用。所以要使得货币的供应量跟这个生产的增

长相适应这是个很长的过程，不能仓促行事。那么问题也就来了？我认为不要搞我们过去那种经济适用房，用在中国的条件下搞经济适用房，一定是有权的人拿到。

国企改革阻力并非不可克服

问：国有资产改革过程中，您觉得政府、国有企业跟民企之间，他们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定位？

吴敬琏：我们理想中的市场经济制度，它是对所有市场主体开放的，也就是说平等对待的。但是现在由于很多具体规定是区别的，有倾斜的，那么这就不行了。

问：江平老师也讲到，国有企业的改革难度实在太大了，阻力很大。您怎么看待这种阻力？接下来真要是改革，怎么去动这个刀子？

吴敬琏：它应该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九十年代中期的国有企业是一个什么状况？整个国有部门是亏损的。因为它全都亏损了，日子过不下去，这个时候改起来可能容易一点。现在可能这个阻力就更大一点，但是我不认为这个阻力是不可克服的，“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你要做，有什么做不了的。

问：您前段时间讲，要通过混合所有制来推动国企改革，那么您觉得接下来应该朝怎么一个方向发展？

吴敬琏：在 99 年以后，改革就做了很多推进，但是并没有到底。比如说有进有退，它从什么地方退，进到什么地方呢？那么十五届四中全会把这个领域具体化，三个行业，第一叫关系国家安全的行业，第二叫自然垄断的行业，第三叫做提供公益性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行业，三个行业一个领域，这就是要进的。

除了要进的之外，其实都是可以退。但是到了本世纪初期，倒过来了。特别是到 2006 年，国资委发了一个文件，说是在 7 个行业，国有企业要绝对控制，9 个行业要较强控制，我不知道为什么发生了改变，也许国进民退它的根据就是这个。

问：您觉得这些问题是怎么造成的？

吴敬琏：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意识形态，一方面是利益。从意识形态说，它打的旗号当然都是意识形态的旗号，就是说社会主义，其实它不是邓小平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利益。陈同海（中石化

原总经理)说得最清楚了,“我们是共和国的长子,我们不垄断谁垄断?”这是利益。

另外这个二级公司、三级公司吸收了一些非国有的资本进来,但是它总是扮演一个补充的角色,或者说当催辈儿(小字辈)的角色,在这种格局之下,它很难行使股东的权利。

若无法治规则,企业家移民潮难止

问:您曾经讲,如果现在要推行混合所有制,应该对过去的一些冤假错案进行平反,还提到了顾维军案,您为什么会提到这个案件?

吴敬琏:有一些改革按照原来的计划应该继续向前推进,结果没有推进,在半途中就停顿下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国进民退,就是没有向前推进,而是往后退了。那么这个退的中间有一个问题是含混不清的,就是发生了一些冤假错案,这些问题最好要有一个交代,就是做对还是不对?顾维军(引发过)很大的争论,而且顾是判了十年徒刑的,他现在要求要平反。它是一个很大的案件,影响了中国,所谓郎顾之争,把我们的经济学家都搅进去了,这个是非要把它弄清楚。

我不是一定判断说顾维军就没有问题,但是总要弄清楚,如果说顾维军是犯法了,他到底是哪些事情犯法。对每一个人,哪怕是个犯罪嫌疑人,大家认为很可能就是他,也要一个公正的审判。

问:实际上民营企业家对于自己财产保护这个问题,还是有很大的担心的。他们身边人甚至包括一部分自己的企业,在过去两年可能会往国外转移资产,三中全会之后,又慢慢地在回流了。您怎么看待这一现状?

吴敬琏:所以我说顾维军的问题要给大家一个交代,到底是怎么回事。它(顾维军案)背景就是这样,因为一些有钱的人和一些有知识技术的人追求移民,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针对这个事情,我们靠什么?从未来来说,要建立法治,不管是物质财富、知识产权、人民的基本权利,要得到切实的保证。

对于过去发生的一些重大的事情,需要把它弄清楚,否则的话,这种移民潮就比较难以制止。

——中财网 2014 年 5 月 26 日

许小年：解读两会后中国经济政策和民企发展

2014 年 5 月 21 日下午，许小年教授在深圳“湘籍精英 高端会聚”上作了主题为《解读两会后中国经济政策和民企发展》的演讲。许教授认为，目前经济数据的走弱、增长速度的下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周期现象，而是一种结构性的衰退，跟大多数经济家理解周期性衰退不一样。周期性衰退，跟冬天到了得了感冒一样，过段时间就好了。但是结构性衰退，是内部得了炎症，如果不动手术，光吃药是好不了的。

许小年：

今天和大家交流三个题目：当前经济的形势、个人对经济政策的分析、在当前情况下企业如何做到转型。

一、经济的情况，中国经济在明显放缓。

今年一季度在多种因素影响下，中国经济明显放缓。官方数据 GDP 是 7.4%，但是这个数字准确性很难考证，GDP 我已经很长时间不看，和在基层看到的现象有很大出入。不看 GDP 看什么呢，克强总理在回答国外记者提问的时候，讲他也不怎么看 GDP，他看三个指标判断中国形势：发电量、铁路货运总量、中长期贷款。这些数字和我们在微观层面观察更加一致。中国经济的放缓速度不是 7.7% 到 7.4%，应该以百分点来记，和去年相比，至少低 1-2 个百分点。

为什么会出现经济的明显放缓？

有多种因素：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产能过剩，中国在过去的十几年最重要的经济增长因素是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的速度放慢，中国经济的增长步伐也就放慢。

而固定资产投资明显放慢的原因：

1、产能过剩、投资乏力。是投资超过消费的情况下，投资形成的产能在市场上无法消化，各行各业、特别是传统行业出现了大量的过剩产能，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投资非常谨慎，在传统制造业最为明显，现在在基础设施方面也过剩了，房地产等等，过剩是全面的现象。在这种压力下企业不敢茫然投资，投资无法找

到市场销路，造成亏损。

2、消费。我们都知道，在投资疲软的时候可以靠消费来拉动，但是，消费要有一定的支持，消费的驱动力是靠收入，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居民的收入是落后于 GDP 的增长（图），因此消费很难弥补投资的损失。

3、全球经济危机，外国需求减退。世界几大经济体，美国、中国、欧洲、日本，在这四个最大的经济体中，只有美国经济恢复的势头较好，复苏正处于上升通道，如果大家做世界投资的话，建议增持美国资产。欧洲仍然在经济危机的泥潭中挣扎。而日本的经济是长期半衰退状态，已经持续 20 年，安倍经济学不能解决日本的机构性问题，个人不看好日本经济。而中国经济刚刚开始下行。

在这种情况下，需求的三个方面都不是很乐观，我想强调的观点是，在需求方不是很乐观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放缓没法在短期之内得到扭转。也就是，我们将长期面对一个低增长的宏观环境，因为刚才所做的需求分析，背后的决定因素不能在短期得到扭转。

不能在短期得到扭转的原因：

1、先看下投资，疲软是因为产能过剩，在过剩产能没有消除之前，投资很难恢复。过剩产能如何消除？一般的市场化办法是结构调整、兼并、倒闭关门，那设想下，有多少企业要倒闭、多少工人要下岗，因此结构调整是要付出成本和代价的，在短期内不可能完成，我们的产能不是过剩 5%、10%，而是过剩 20%、30%，最严重的行业要过剩 50%，这些产能不消除没有人敢投资，除非找到新的增长点，在新的行业产能还不过剩。因此下一轮投资的高峰要等过剩产能基本消除才能到来。

2、再看消费，消费也不会很快起来，因为消费依赖收入的支持，而在过去十几年，居民收入占 GDP 的比重在不断下降，看下数据（图），

克强指数一，发电量（图），2008 年以前跌入谷底，在 08 年极具反弹，因为四万亿，而四万亿的效果像打鸡血，亢奋状态不能持续很长时间，09 年发电量增长率迅速下跌，跌到 2012 年下半年，发电量又起来了，原因是四万亿 2.0，由于没有大量媒体报道，四万亿 2.0 仅有少数人知道，（四万亿出台没几天，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批评四万亿，现在出台四万亿是饮鸩止渴，理所当然没被发表，在过后很长时间才被发出来。）打鸡血的经济不能维持太长时间，四万亿 2.0 的

效果持续时间更短，今年一季度发电量再度掉头向下，我认为全年都将继续下滑。

不是靠经济的有机增长，而是靠政府来拉动内需，不可能扭转经济运行的方向。可持续发展的引擎在企业，在于企业效率的提高、企业的创新。政府的资源是有限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政策性的刺激，只能维持短暂的繁荣，即使政府推出四万亿 3.0，效果也是昙花一现。企业不必过于关注宏观政策，还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克强指数二，铁路货运总量（图）。带给我们的信息和发电量完全一样。在政策刺激逐渐消退的情况下，经济按照原来的轨迹继续下滑。我们已经进入低增长的时期。

消费不会短期带给我们惊喜，看下国民收入分配（图）。数据来自清华大学两个教授的研究。

百姓的收入不是没有增加，而是落后于政府收入的增加、GDP 增长、企业的生产能力增长，于是出现消费内需不足，是相对不足，是相对于生产能力（有钞票支持）的内需不足，如果这个趋势再持续，消费会更加疲软。改变这一现象，可采取全面减税，减少政府收入、增加百姓收入。收入分配是敏感的经济和政策问题，短期内不可能得到调整，结论是中国经济的低增长要持续较长时间。企业家要对这个冬天的做好充分的估计。

二、个人对当前政策的分析

网上有句话很传神，政策的基调是微刺激。过去温总强刺激，现在强总温刺激。

强总为什么微刺激，有几个原因：

1、政府已经意识到四万亿强刺激的负面后果（个人猜测），大量产能过剩、浪费、贪污腐败、更严重是打乱了企业的预期，阻碍了经济的结构调整。

我曾参加一个钢铁企业的年会，大概是四万亿之后两年，一国有钢企老板说四万亿把我们坑苦了，本来在四万亿之前，我们准备调结构，把低端产品、低附加值产品淘汰掉，增产高端和高附加值产品，突然四万亿下来，低端的螺纹钢、建筑钢最赚钱，订单忙的生产不过来，钢厂很难受，低端产品的生产能力不够，要不要扩建，做企业的看不了那么远，本来都要淘汰了，反而扩建、扩大低端产能，现在全过剩了。（有钢企老板问政府什么时候再出政策，我说你吃苦还不够

啊，还要受二遍罪？）政府不能干预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刺激的效果。

2、政府也没有四万亿的资源了。没钱体现在地方政府大量的负债，中央政府还有钱修修高铁，高铁没有收益，投资不能回收，政府没钱。

3、本届政府把经济增长寄托在新的改革红利上。确实推出一些改革措施，开放国有部门，宏科经济，简政放权，减少审批等等。

不管什么原因，我认为在近期政府不会再出台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性政策。对于这一点，克强总理、央行行长、财政部都表明了态度。因此，我们不要把企业的未来寄托在政府的政策上，要踏踏实实把企业做好。

下面我们分析下到目前为止的一些改革措施，及对经济产生的影响。

改革的方向和思路都是很正确的，比如，混合着所有制、借助市场和民企来改造国企，开放行政垄断行业、中石化开放下游的加油站、铁道部开放投资，简政放权、减少审批，现在注册公司手续大大缩短，工商税务的障碍减少很多，但是方法上还是值得商榷。

值得商榷在于，1、对于混合着所有制和开放行政垄断行业来说，要解决民间资本的产权保护问题。据我所知目前的民间资本参与积极性并不高，比如就，加油站开放 30%股权，让你当小股东，有学生问我可不可参与，利益怎么能保证，董事会能不能有席位，得到的答复是没有，那么参与的角色是什么，只是出资人，小股东不可能改变国有大股东的想法，那么权益就没办法保护。因此，简单的开放不能解决问题，必须要有有效的民间资本的产权保护。

我建议，1、过去明显的冤假错案要平反，比如一些侵犯产权的事件。一些民营企业把资金转移到海外，就是认为国内的环境不安全。我在加州 3 个月，所到之处基本可以不讲英文，满大街中国人，不只是游客，看到的中国人买房子、找律师办移民，把资金转移到外面，美国人抱怨，房价都让中国人推上去。民营企业把资金转移到海外是认为国内的环境不安全。2、推荐司法改革，建立独立的、透明的司法体系。经济的改革，如果没有司法和政治的配合，不会达到所设想的结果。

2、第二个在改革方法上可以商榷的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是不是足以克服既得利益的阻力？

到目前为止的改革，比如，上海自贸区没有实质的变化，只是周边的地皮被

吵起来，医疗体制的改革也在推进中，但没有显著进展。为什么呢？原因在于既得利益的阻力。上面长官下命令也很难克服下面既得利益的阻力，本人信心不足。在自贸区开放资本账户，反对者会说过快的自由开放影响国家安全，会冲击资本市场，不能开放，而这些人大多是政府部门，一旦开放他们的作用就没有。银行也反对，别人冲进来把他的蛋糕分掉，这都是既得利益，从几个大银行要围堵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就可以看出。

因此，对于改革红利，要有一个很现实的预期，阻力不能低估。

在这个情况下，企业怎么办？——为漫长的冬天做好准备

在长期低增长环境下，企业怎么应对？

1、短期：收缩战线，回收现金，宁可踩空，不要断粮。

把握不住政策、维稳大不了少赚，而扩张的风险是现金流断掉，我认为断粮的影响远远大于踩空。在经济下行的环境下，金融机构是保守的，要控制风险，融资会比以前更困难，企业更应该保守经营。在现有市场和现有产品这一端保守经营。

2、中长期：要思考转型，意识到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今天依靠低成本扩张、抢占市场的时代已经结束，低成本获取技术的时代也结束了，不会再有市场等着大家去占有，要告别旧时代，面对新时代。过去的后发优势是可以照抄，用低成本获取市场上现成的技术，买个麦克风就可以照抄照做，而如今的产品的抄不来的，买一百台苹果手机，你还是不会做，现在的技术不可能用低成本获得，劳动力成本已不再是关键因素，由麦克风转向智能手机时代是巨大的挑战。创新和研发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而不是成本。因此，做企业一定要思考转型。

企业转型谈了很多年，但成功的案例还是少数。我所观察出的原因是，我们的企业还没有到生死攸关的时候，日子还过得不错，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现在是时候思考转型了。影响企业转型的潜意识是“做大永远优先于做强”，潜意识根深蒂固，因为大企业可以得到政策的优惠、更好的法律保护，规模大似乎是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而不是好和强。在过去，当我们有现成产品和技术的时候，做大很容易，发展起来顺风顺水，而现在市场饱和，成本上升，新技术和新产品的获取越来越困难，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做大变得困难。

转型最困难是观念的转变，企业家要在哪些方面转变观念？

转变 1、中国的企业家缺乏自己的内心世界，个人价值不是由自己来确定尺度，是由客观衡量标准决定的。

每个人都在追求成功，但成功的标准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钱。不光是企业家，很多中国人都是这样，在社会上，孩子要上名校、职业经理人年薪多少、企业家有多少资产，在这种衡量尺度下，孩子要努力学习上名校，创造力极差，企业家除了赚钱没有其他乐趣，个人价值的体现是企业大、赚钱多，而不是生活幸福和内心的宁静。反应在做企业上就是追求规模，而不是追求百年老店，原因是内心的贫乏，内心是由别人把货币尺度塞进去填充的，没有内心追求。这是企业转型的一大障碍，做大就没有办法做精和转型。

那么，企业家不追求赚钱追求什么呢？举例国外企业家的心理活动和状态，推荐德国社会主义学家马克思韦伯写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用商业的成功荣耀上帝，经商不是谋求生存的手段也不是为了享受生活，财富积累只是手段，证明获得上帝的恩赐，因此在经商中心态很平和，可理性的持续经营，对于不信宗教的中国人来说很难理解；2、赚了钱后不会奢侈浪费，而是做慈善事业，比如盖茨和巴菲特，身价几百亿还是勤恳的工作，巴菲特投资了一家中国公司，我通过这家公司联系上去拜访巴菲特，他的办公室很小，只有一个沙发、一个桌子，桌上放了一台电脑，满桌子上都是研究报告。人的享受是没止境的，荣耀上帝是没止境的。巴菲特只把财产的 1/4 给了子女，3/4 都捐献给盖茨夫妇的慈善基金会做慈善事业。因此，要把企业做好，中国企业家应该认真思考建设自己的内心世界。

转变 2、赚钱和创造价值。

赚钱不一定能创造价值，创造价值必然会赚钱。价值创造一是你为市场提供的新产品和服务，乔布斯为人类创造了几大的价值，他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产品，腾讯是价值创造的公司，微信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状态，第二个价值创造是用更低的成本向社会提供了已知的产品和服务。微信在很长时间是赔钱，如今赚钱了，它为社会提供了价值，或迟或早都会承认。企业转型要思考如何创造价值。

例如，阿里金融创造了价值，它带给了我们新的金融产品，方便了中小企业融资，在众多互联网金融公司，阿里是为数不多创造价值的公司，如果互联网金

融公司不创造价值，或迟或早都要倒掉，一些小额贷款公司做的是和阿里相同的事情，都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但其他公司却没有创造价值，做金融放贷最困难的是征信，小公司无法判断客户的信用，只要能判断客户信用，那么贷款只剩下一系列程序，阿里是如何做信用评级？阿里有海量的数据，在阿里的平台上，交易的数据都是阿里宝贵的金矿，再用数学模型推算，因此阿里可以比较准确的把客户的信用评级算出来，不会盲目放贷，根据风险等级决定贷款数量和利率，使过去没有抵押的公司也能贷到款，这就是阿里创造的价值。而其他小额贷款公司无法以低成本为客户算出信用评级，虽然在赚钱但没有创造价值，因此我不看好他们的发展。

互联网思维是很荒唐的提法，本人是不太互联网是人类历史上众多的创新之一，人类第一大创新是蒸汽机，但我没听过有蒸汽机思维，随后是铁路、电子，也没有提到思维，国外根本没有互联网思维，我们经常忽悠别人也把自己忽悠进去，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利用互联网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为客户创造价值。

（以上内容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未经本人校稿）

——搜狐财经 2014 年 5 月 23 日